

凉山彝族 奴隶社会的变革

资料摘编

韦清凤 冯小舟
王伯仲 李家秀



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 民族理论研究室
民族学研究室印
一九八一年八月

前 言

摘编这本资料的目的，是为研究凉山彝族奴隶社会的变革问题、我国现代民族问题、党的民族理论和民族政策问题等提出一些原始材料；对研究凉山彝族奴隶社会的同志来说，这个社会剧烈变动时期的事实也具有特殊价值。

凉山地区的奴隶制，早在秦汉时期已露端倪。魏晋前后，彝族先民进入凉山，发展了奴隶制。由于这个社会以毫无劳动兴趣的奴隶为主要生产者；由于山地农业、手工业生产条件很差；由于地理上相对隔绝，很难有与先进地区在生产技术上的交流和商品交换；由于对奴隶劳动的需求而发生频繁的掠夺奴隶战争和历代中央王朝对凉山的很多错误政策，而使凉山周围民族关系紧张，彝族受到歧视、封锁和孤立。由于这一切，彝族社会生产力及整个社会制度的发展便十分缓慢。直到本世纪中叶，凉山彝族基本上还停留在十分落后、野蛮的奴隶社会中。

在奴隶制度下被压迫的人们，从切身的痛苦中种下了对自己主人的仇恨。他们曾以怠工、诅咒、虐待耕畜、破坏农具、逃亡、自杀及杀死主人等方式进行反抗。十八世纪中，在今布拖地方发生了“赤黑”（对奴隶的贱称，意即吃狗肉者）奴隶的集体反抗。进入二十世纪，奴隶斗争明显发展。辛亥革命影响下的“拉库”（意即“虎年”，指1914年）起

义，震动凉山。会理“娃子寨”的斗争，坚持八年。临近汉族的一些边缘地段，出现了没有黑彝贵族统治的“独立白彝”地区。奴隶反抗的明显加剧，证明这个社会已濒临绝境，只是由于奴隶阶级的历史局限，他们的斗争才未能成功。

对凉山地方紧张的民族关系，统治中国的人们长期不能从社会制度的差异和狭隘民族主义的危害上看问题，或认为出于彝族“天性”，或认为源于“汉奸”作祟，或认为地方官员“无能”。数十次大规模的讨伐，多达三万甚至七万兵力的封锁，成百上千代理人的委任，屯田制度，人质制度，保甲制度，护路制度等等，除了造成彝汉人民深重的灾难和某些短暂的宁静外，没有根本的解决。凉山彝族社会成为只有探险家才能了解些微的神秘社会。随着国家政局的兴衰际遇，凉山周围民族关系时松时紧。本世纪二十年代，在洋烟洋枪的刺激下，奴隶制一度发展，民族关系也达到罕见的紧张。直到资产阶级思想在国内传播甚至对马克思主义也若有所闻的清末民初，才出现禁止黑彝蓄奴的主张。民国年间的资产阶级及其文化人，从不同的目的出发，提出了解放奴隶、恢复人权、“打破阶级、上下一致”、改奴为佃、主奴和谐等主张；但他们没有对历史上长期的大民族压迫作出检讨，反而在大民族主义的支配或影响下，提出迁走黑彝、碉堡封锁、强迫同化、“解散”彝族等荒唐建议。受资产阶级影响，个别彝族上层也有过改革的愿望甚至某些改良措施。仅仅这些，当然丝毫动摇不了奴隶制。国民党政府的许多反动措施，还引起了彝族上下层的深恶痛绝。

随着我国人民革命的胜利和凉山的解放，彝族社会的改

革成为可能。为了彝族人民的发展进步，中国共产党积极领导了彝族人民消除奴隶制的斗争。鉴于凉山地区特殊的民族历史环境，党和人民政府采取了有别于汉族地区的若干政策：为保障彝汉民族团结，向凉山进军是和平的，主要在争取彝族上层的见面、赞助和欢迎；为建立稳定的社会秩序，调解了大部分是奴隶主集团间的“冤家”矛盾，吸收了数以百计的彝族头人建立起统一战线的人民政权；为避免改革引起民族矛盾，使改革成为彝族自身的革命行为，培养了一批包括奴隶和贵族出身的革命干部，在解放军中建立了“彝民团”，党和国家领导人亲自接见、教育大批贵族奴隶主；为避免改革引起民族间和彝族内的流血，规定了改革中不关、不杀、不斗争、不反霸、不挖底财、浮财等政策；考虑到少数民族长期遭受的不公正待遇，不断地批判大民族主义并提出“代祖宗还债”，通过大规模救济、贷款、免费医疗等，向彝区作了物质上的支援，改革中又由国家出钱向奴隶主购买某些比当地平均数多的生产生活资料，转分给奴隶；对近十万失掉贵族和奴隶主地位的人们，以安排工作、发给补助、允许雇工，留足土地、耕畜、农具、粮食等方式给以出路；在反改革活动变成武装叛乱并发生可悲的流血时，政府采取了以政治争取为主、军事打击为辅、停战和谈、既往不咎、来去自由、学习改过等作法，组织了大批赞助改革的奴隶主作解释争取工作，收到良好效果。改革以后，为使生产力量十分薄弱的奴隶能尽快发展经济，由国家出钱出人帮助组织了集体生产单位，整个彝区建立起了不允许人剥削人的社会主义制度。这一些不仅较为切合凉山实际，而且在一切因社会制度不平衡而相对落后和有民族、历史隔阂的局部地

区进行社会改革时，都是可以借鉴的。从一九五六年初到一九五七年秋，凉山的民主改革取得了伟大胜利，约三十万奴隶得到自由，约六十万隶属民得到翻身。虽然人们还没来得及树立起“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观念，新的生产关系也还在摸索与完善中，但等级压迫、阶级剥削是根本上消除了。在这片相当于两个比利时的面积和两个蒙古人民共和国人口的地方，两千年来第一次出现了团结和安宁。

凉山的民主改革是伟大的。地主阶级大张挾伐莫可奈何的奴隶制，资产阶级口诛笔伐同样奈何不得的奴隶制，使彝族人民受苦受难而无法摆脱的奴隶制，由彝族人民在共产党领导下彻底废除了。这是凉山地区，凉山彝族历史上最重大的事件，这场改革，较之中国地主资产阶级的血腥镇压、迁走黑彝、解散彝族、强迫同化，有着本质的不同；较之凉山奴隶阶级自发起义时对黑彝的“斩尽杀绝”，较之白彝“独立”时的“提高等级”，也有极大不同。较之美国的南北战争，我们解放奴隶的目标明确，美国是作为资产阶级的战争手段而解放奴隶；我们使奴隶获得了自由、平等权利，美国黑奴竟长期得不到公民权；我们消除了民族压迫，美国则保持了种族歧视。和平的改革虽未实现，但经过改革时期的阵痛和相当长一个时期的摸索，彝族人民可以在平等团结关系中去建设新的生活了。

这场轰轰烈烈的革命，其成绩方面，人们通过当时某些报导有所了解。但是整个改革的过程及其各方面，人们知之不多。教训方面，可以说至今未有认真总结。当斗争方兴未艾时，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即对在凉山工作的同志说：“凡是工作中的缺点错误要承认，工作中的好经验要坚持。

“好的坏的都让人民知道，这就是我国人民政权的特点。”不久，邓小平同志在谈论四川藏族地区的民主改革时也讲：“这个阶段（指1957年3月前）的经验很重要，要把这段经验当作很好的东西来吸取。”曾为这场斗争流血流汗的彝、汉、藏、回等十多个民族的人们，国内一切关心民族地区发展的人们，国外十分注意我国民族地区特别是凉山情况的人们，都希望对这场斗争有个全面的记述。了解这场斗争全面情况的同志不多，他们多数没有时间作理论工作，且有的年老多病甚至或已不在人世。反映这场斗争的一些原始资料已有散佚情况。因此，对这个特殊社会的特殊转变作出实事求是的记述和分析，已成为社会科学工作者迫切的任务。

一九七九年的夏天，这项任务列入了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的研究计划。在我们赴凉山等地收集资料时，伍精华、瓦渣木基、王海明等彝族同志，原在凉山担负过领导工作的王维训、唐兴盛、张荣、杨植森、刘清顺、韩学禹等同志和原彝民团部队的负责同志为我们提供了很多工作的方便，补充了若干重要事实。西昌、昭觉、雷波、喜德、宁南等档案馆的许多同志以及凉山军分区作训科的同志，为寻找有关资料作了大量工作。彝族前辈果基木古、阿侯鲁木子、岑光电、安学成、杨代蒂、李明阳及我们所到十余县会见到的政协委员们，无保留地向我们介绍情况并给以盛情接待。在此，谨向上述同志们表示谢意。

参加资料选编工作的有韦清风、冯小舟、王伯仲、李家秀。

资料来源主要是我们在凉山各地摘抄的各种工作报告、会议记录、文件、战史和某些书报片断，其次是访问、调查

笔记。凡原有标题的文件均加书名号，注明草拟或印发时间；原件无题或无时间的，根据我们对内容的分析结合其在凉山收存的时间等尽量标出题目和时间以便查阅。从调查笔记中摘抄的则标以某人口述。资料所用“凉山彝族自治州”指当时的凉山即今凉山的东十一县（当时是十四县）摘编时未作改动；一九七九年并入凉山的西昌地区八县和划入渡口市的米易、盐边二县，云南的宁蒗、永胜、华坪三县（小凉山）都有彝族分布，当时的过程大体一致，有关资料也作了选编。为便于查阅和研究，由韦清风编了大事记和部分历史资料。

这个资料在目前还只是作为我们编写和研究凉山彝族社会改革问题书稿的内部资料，若干党内材料在未公开发表前，请勿引用。

由于编者思想、业务水平有限，错误处一定不少，敬乞指正。

编 者 一九八一年八月

目 录

前 言

第一章 凉山的解放

- 第一节 国民党军队在凉山的失败 (1)
- 第二节 进军凉山
 - 一、 凉山南部的进军 (12)
 - 二、 开展凉山中部民族工作
 和平息美姑叛乱 (35)
 - 三、 争取岑邦正、完成北部和平进军 (44)

第二章 解放初的民族工作和民主改革的准备

- 第一节 促进民族团结 (52)
- 第二节 建立人民政权和安定社会秩序 (62)
- 第三节 民主改革前的阶级斗争 (76)
- 第四节 民主改革的准备 (88)

第三章 叛乱和前期平叛

- 第一节 反改革叛乱 (119)
- 第二节 前期平叛，自卫队和进步上层
 在平叛中的作用 (129)

第四章 民主改革的政策和施行

- 第一节 民主改革的方针政策 (137)
- 第二节 动员民主改革时的斗争 (167)

第三节	民主改革的施行	
一、	初期改革情况	(174)
二、	奴隶的解放和安置	(198)
三、	奴隶主的安置和俘虏政策	(214)
四、	对枪支的处理	(224)
第五章	“更加宽大”的方针下	
第一节	改革中期的政策调整	(229)
第二节	中央慰问团访问凉山	(257)
第三节	停战和谈	(277)
第六章	民主改革的胜利	
第一节	后期改革和复查补课	(292)
第二节	晚期叛乱的特点和后期平叛	(317)
第三节	民主改革的胜利	(338)
第七章	婚姻改革	(354)
第八章	社会主义制度的初步建立	(372)
附录：一、	部分历史资料	(397)
二、	大事记	(430)

第一章 凉山的解放

第一节 国民党军队在凉山的失败

残留在西昌地区的胡宗南贺国光部队的官兵们：被胡贺两匪特务监视挟持下的少数彝兵同胞们，人民解放军的主力部队，已开始了对西昌地区的围剿作战，并已击破了前进路上敌人的一切抵抗而胜利地强渡了天险的大渡河与金沙江，对西昌业已构成合围。不管胡贺匪首如何诈骗阴谋也是万难逃脱的。摆在你们面前的出路，就是当场起义，回到人民的大家庭来，为人民服务，或立即放下武器向解放军投诚缴械。如有反动长官与特务阻扰者，则杀而行之。蒋贼培植二十二年的所谓胡宗南主力大军被围於成都附近时，除顽强抵抗者被消灭外，或者起义，或者投诚，至今都受到人民政府的优待，进行整训，有愿意回家者则资送回家，我们对残留西昌之部队仍是这样处理。你们对人民为善为恶，对个人是安是危，必决此於刹那之间，胡贺残部将士们，被挟持的少数彝兵同胞们，情况太紧急了，时间太急了，起义吧！缴枪投诚吧！西南军政委员会主席刘伯承 西南军区司令员贺龙、政治委员邓小平、三月二十五日。

《刘伯承、贺龙、邓小平三将军忠告

《残留西昌胡贺部队》见1950年3月27日《新华日报》。

我人民解放军西南军区主力部队一部，于本月中旬发起对盘据西昌地区残敌胡宗南、贺国光匪部之歼击战，现已击破当面残敌之抵抗，于二十一日至二十四日胜利渡过天险金沙江、大渡河，占领会理、宁南、汉源、富林及康定、泸定铁索桥等城镇、要地。现正乘胜向西昌进击中。按蒋匪西昌警备司令贺国光匪部自我解放军结束了成都作战以后，收容残兵败将，企图负隅作垂死顽抗。胡匪宗南并于一月二十八日由海口飞西昌。蒋匪近更委胡匪为西南长官公署长官，贺匪为付长官，以指挥西南残匪特务，企图以该地为基点，继续其在大陆的反革命武装活动。然而这些垂死挣扎，在强大人民解放军进击下，必将最后被粉碎。

《西南军区主力部队一部歼击西昌地区残敌》见1950年3月27日《新华日报》。

进击西昌地区残匪之人民解放军西南军区某主力部队一部，已于二十七日解放西昌城。守敌向东逃窜，我正分头追歼中。人民解放军向西昌进军途中，严格遵守群众纪律和少数民族政策，受到沿途各地彝族同胞的热烈欢迎。彝族同胞曾配合人民解放军在昭觉以南截击胡贺残匪刘孟廉部。

《我军解放西昌城》见1950年3月29日《新华日报》。

西昌地区位于西康东南部，毗邻云南。匪胡宗南、贺国光聚集其一军、三军、二十七军、一二四军、六十九军等残部及国防部警卫团共万余人，盘据于此，并以三三五师控制

乐西、康滇公路之枢纽——富林。凭籍山河之险，利用民族隔阂，勾结当地封建势力，梦想以西昌为据点，建立所谓“大陆游击根据地”，作最后挣扎。

为消灭胡、贺残匪，解放西昌，西南军区于1950年3月初组织西昌战役。军（62军）决定以184师全部由北向南，以团为单位，分别由康滇公路、乐西公路及峨边之盐井溪，开建桥，越西之大田坝、海棠前进；并以185师553团一个营由荣经绕道进击农场，首先歼敌335师于富林地区，得手乘胜南下，与云南兄弟部队44师、43师一部，对西昌形成南北夹击，以全歼敌人。

我184师于三月十二日由温江出发，师指挥所率552团，沿乐西公路疾进，二十日进至峨边之金口河，即开始与敌335师警戒部队接触，敌拼命抵抗，沿途破坏道路，阻我前进，并企图固守黄木厂、马烈关，以掩护其主力进军，经我猛烈攻击，将敌击溃。二十三日我攻占富林，由于迂迴部队未能及时将敌退路切断，我仅俘敌百余人，敌大部渡过大渡河，扼守大树堡，与我隔河对峙，妄图苟延残喘。24日我军在当地群众支援下，强渡大渡河，敌不敢应战，望风而逃，我即跟踪追击，该团虽在晒经关、水坝、廖叶坪，几次追进敌人，但由于地形限制，不能采取平行追击，致敌335师与西昌窜来之敌会合于甘相营鸡窠沟。

取道盐井溪、开建桥之550团，由于事前对情况了解不够，当行至贝吃尔坡山时，积雪尺余，道路难行，且羊村河、牛日河桥梁已被破坏，致未能按时到达海棠堵住敌人，亦是敌能逃窜的原因之一。

551团经雅安、荣经、于二十三日解放汉源，二十四日

进至富林。同时553团一个营二十五日占领农场。551团则按计划经农场继续前进，于二十八日解放冕宁，前进至泸沽地区开展清匪工作。

三月二十七日我兄弟部队44师解放西昌。

我552团查明敌在甘相营、鸡窰沟附近后，遂于三月三十一日夜，发起攻击，四月一日全歼敌西南长官公署、第一军残部、国防部警卫团，此时敌69军、335师残部、宁、雅联防司令羊仁安等部、向越西逃窜至，至小相岑附近，遭我550团两个连猛烈堵击，该团主力迅速赶到，将敌全歼，计毙伤俘共四千余人。战斗结束后，我继续向西昌进军与44师胜利会师。

四月七日，我550团二连由德昌出发，向窜往普雄之敌338团发起追击，歼敌五百余人。在战役胜利的威声下，向盘据昭觉之敌27军开展政治攻势，该敌除军长带少数人逃跑外，其余全部缴械，至此西昌战役胜利结束。我184师共歼敌西南长官公署、69军、335师、宁雅联防部、靖边部七千余人。其中毙敌有五兵团司令兼69军军长胡长清、付军长鲁孟林、游击司令罗子洲，俘敌有宁雅联防部司令羊仁安、付司令王炳贤、胡匪行辕付参谋长沈策、一军一师师长朱光祖、335师师长王伯华，争取敌靖边司令邓德亮、代司令孙子汶等向我投诚；缴获山炮一门、八二迫击炮十一门、火箭筒两具、重机枪二十八挺、轻机枪一四八挺、长短枪二四一支。

西昌军分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六十二军战史》第五章第一节，摘自1964年5月中国科学院民族研究

所四川民族调查组《四川彝族人民的解放》。

当一九四九年十二月情况极其紧张之际，胡宗南曾由新津空运了数千人占据了西昌。那时解放军尚来不及向西昌进军，因而胡宗南凭借这几千人的力量又在西昌呆了两个月。听说他在西昌时终日绕室徬徨，有时大笑，有时痛哭，常捶胸顿足，骂蒋介石为“老糊涂”。

宋希濂：《解放前夕我和胡宗南策划的一个阴谋》，《文史资料选辑》第二十三辑。

由胡（宗南）的车子送我到了北较场，下车后有一个穿便服的人问我：“你是十八兵团李司令官吗？”我说：“是的，我就是李司令官。”他说：“好，请到里面坐。”边说边走，把我引到接待室里，又问我：“李司令随身带有什么武器？我们为了表示对总统的尊敬，凡是和总统见面的人，都不能带武器和佩剑之类，有的话，请你先放在这里。”我不待他说完即回答说：“我没有带什么武器。”经过关卡般的接待盘问之后，才把我引到一间会客室里。由下车到这里，时间虽不长，我觉得空气过分紧张而肃杀，大有大祸就要临头般的不自然。正想到这里，那个穿便服的进来告诉我：“总统马上就来。”不一会蒋介石出来了，没有丝毫笑容，一看就知道他沉浸在忧虑神伤之中，睡眠不足，很困倦的样子。他轻微点了点头说：“你来了。好，坐下，坐下。”他问我兵团现驻什么地方？共有多少人？装备齐全吗？我一一作了回答。他说：“赶快找胡主任补充。你这个部队过去打得很好，官兵都很勇敢，这种精神要保持下去。……你要好好的

同全体官兵说清楚，要好好的鼓励官兵。我们不在一城一地的得失，只要大家同心同德，群策群力，反攻复国是很容易的。你们很快就要向西昌集中，西昌是我们最后复兴的基地，这个地方很重要。我们要用这个地方来对付敌人，收复失地。你到了那里，要据险坚守，好好的把民众组织起来共同对付敌人。如果敌人重兵来犯，不要同敌人胶着恋战，要部队互相掩护，逐步向云南、缅甸边界转移。利用中缅交界地带，打下根基，整顿部队，等候时机。美苏交恶甚深，他们是势不两立的，战争一触即发。第三次世界大战暴发，就是我们反攻复国的时候。”

李振：《起义前的几点回忆》，《文史资料选辑》第二十三辑

这天（1949年12月8日）晚间，刘文辉、邓锡侯在蒋处宴会后，即驱车出成都北门去彭县，9日即联名通电起义。同日，卢汉也在昆明起义。刘文辉的女婿伍培英率一个师在西昌起义，被李昆岗和西昌警备总司令贺国光所解决。10日，蒋即由成都夹起尾巴逃往台湾。12日，李昆岗由西昌飞成都向胡宗南报告在西昌解决伍培英的经过和恢复西康省政府组织人事的意见（西康省政府主席原为刘文辉，刘起义后瓦解）。胡同意贺国光兼任西康省府主席，在西康恢复省政府组织。胡还准备运一个师去西昌，因无飞机运输作罢。……

1949年12月19日晚，人民解放军的前队，南面攻到新津河对岸，与胡军隔河炮战；东面攻到简阳、仁寿，亦已发生接触；北面攻战绵阳，正向广汉挺进。胡急了，决定突围逃西昌，当即向蒋请示：（1）将西南军政长官公署的高级人员以及主要职员，带同重要文卷档案和电台用飞机运往西昌；

(2) 集中兵力往雅安、蒙衣岭和雷马屏峨地区三个方向脱围，目标是雅安、西昌、泸定、雷波。蒋复电令胡率部队脱围，并准派二十架运输机运载逃西昌的人员。……

12月22日上午12时，分乘由海口飞到双流机场的二十架运输机起飞，原定直飞西昌，因气候不好改飞海口。……

胡住海口的办事处长程开椿、付处长王化兴为胡准备了两天两夜。28日晨6时，由胡率领分乘十架运输机从海口转飞西昌，带有简单文卷、电台及卫士连。……

新村是蒋介石在西昌的行辕，是行辕主任张笃伦1938—40年间建筑的，都是平房，散筑在山的半坡上，约有一两百间房子。胡即住在蒋介石的官邸，其他随行人员及卫士即散住在村里，外面有朱光祖一团人保护。

28日下午胡刚住到邛海新村，即令电台联络在川西溃败的部队。……

1949年12月29日，蒋介石从台湾给胡一个十万火急的电令，给他两个任务：一是固守西昌三个月，等待国际变化；二是收拾川西脱围的部队，加以整编，保卫西南大陆。……当时大家分析了国际国内局势和胡掌握的部队情况，认为……（6）西昌是个彝族区，汉人很少，一旦失败，将全部复灭，石达开即行先例。诸葛亮虽对孟获七擒七纵，亦没有把他们感化过来，只有威才能镇摄他们，我们现在的威是没有了，他们是会收拾我们的。……

1950年3月初旬，蒋介石派参谋总长兼西南军政长官公署长官顾祝同和他的大儿子蒋经国秘密飞到西昌，召开大陆上的最后一次军事会议。……

会议共开了七天，礼拜日都未休息。……

会议开完，顾祝同、蒋经国、李沁和余程万就偷偷地离开了西昌。……

胡宗南是3月26日中午12时由城隍庙回邛海新村的，下午未到城隍庙办公。约下午8时左右，罗列同赵龙文很慌张地同车去邛海新村，罗列对我和周士冕说：“龙文要去台湾，我陪他去请示，立刻就回，你们不要离开。”10时左右，罗、赵二人回到城隍庙对我们说：“情况很紧急，共军已绕过德昌，正向飞机场方向进逼（西昌飞机场在西昌东郊距西昌县城三十五华里，距邛海新村三十华里，距德昌县城四十华里左右——原注。编者：西昌机场在西昌城西约十五华里），已派一个营到飞机场作作战准备。”罗列当即命令各单位准备行动，听候命令出发。同时，赵龙文和蔡肇乘车去飞机场，蒋竹三带了两个付官去邛海新村，罗列为周士冕、沈策、王炳炎和我准备了一部汽车，他要裴世子、代涛同他坐一部汽车，必要时由飞机场旁边冲过到泸沽镇（由西昌去泸沽镇必须经过飞机场）。我们都在罗列办公室等候胡宗南下命令出发。

不久，忽然听到飞机声响了，我和周士冕王炳炎还正在说赵龙文他们起飞了。罗列用电话问飞机场的情况，说了一声：“怎么？他飞走了，他妈的！”就把电话耳机一摔。我们问怎么样，罗列说：“胡宗南逃走了，他妈的！”我一看表，正是1950年3月26日11时10分。大家顿时默无一言，面呈土色，只有周士冕骂了一句：“胡宗南一贯只顾自己，不管旁人的死活。”……

1950年3月25日晨，唐式遵率领伍道垣、周瑞麟等带有机枪两挺，步手枪三、四百支，同羊仁安、罗八千岁一路离